

# 三邊互動

## 三邊互動

### 三邊互動

隨着近年人工智能取得突破性發展，加上創新科技普遍被視為未來全球經濟的增長點，本刊計劃恢復「科技文化」欄目，刊發有關人工智能、創新科技發展的消息和短評，歡迎各界專家學者賜稿。

——編者

## 「改革開放」的兩難

最近看到《二十一世紀》2023年12月號的評論專欄「改革開放：回顧與反思」，感到十分驚訝。朱嘉明〈中國經濟改革四十五年的思考札記〉直接明白地說：「中國改革不應該成為『沒有終點』的歷史事件」；姚洋〈從改革開放到新時代：中國正在經歷怎樣的變化？〉則乾脆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不同於改革開放的新時代。這些宣告改革結束的言論不僅會引起社會的廣泛緊張，亦與中國的官方立場大相逕庭。就在該期出版不久的2023年12月18日，《人民日報》刊發了〈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引領新時代改革開放紀實〉，表示「中國改革開放的信心和意志不會動搖」。我們應該如何理

解？任何歷史事件都會有終點，但中國的改革恰恰只能成為「沒有終點」的歷史事件，這是因為在中國當下的語境中，「改革」是與「文革」相對的，改革結束很可能意味着文革重演。正如秦暉所言：「『走向哪裏』我們從來就沒有過共識。至於走出文革，則是全社會的共識」，只要沒有人敢冒這一天下之大不韙，「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中國改革（其實僅僅是經濟改革而已——朱文的標題就說明了這一點）就會一直走下去。

「改革開放」常被當作一個詞來使用，「改革」又常常單獨使用，以至於改革與開放的關係常被人忽略。已經有人意識到，開放是推進改革的動力，改革開放關鍵在於開放（周雪光：〈從大歷史角度看中國改革四十年〉〔《二十一世紀》2018年12月號〕）。因此，與早已成為雞肋的經濟改革相比，中國是否能保持開放才是最受人們關注的風向標。近年來，任何暗示中國關上大門、遠離國際社會的捕風捉影的消息（如指路牌的英文翻譯用拼音代替，或是外資撤離的報導），都會被視為改革倒退、文革再起的標誌，在輿論場（特別是互聯網）上引

起一陣風波。任憑最高領導人說多少次「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也無法擺脫風聲鶴唳，從一個角度說明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意識是建立在恐懼基礎上的，這種「自危機而始，因恐懼而續」的改革意識無論如何都不能說是健康的，也必然無法指引中國未來的健康發展。這種扭曲的改革意識也可以用來解釋中國思想界的一些現象，比如對福利國家的恐懼以及對西方「白左」的敵視等。

既不希望改革開放走到終點，又隱約覺得改革開放走不下去，這就是當今中國「改革意識」的狀況。事實上，改革共識破裂的觀點早已有之，如果要我指出一個改革共識破裂的時間點，那不會是姚文所說的2017年中共十九大，而是2011年「重慶模式」風頭正盛的時候。薄熙來沒有（出於他的個人經歷和身份，也不會）宣稱他的做法是改革的一種替代品，但社會上廣泛存在將其與文革聯繫起來的看法，說明坊間認為它就是改革的反面；而自上到下、從現任最高領導人到各路學者再到基層群眾對「重慶模式」的吹捧，恰恰是扭曲的改革意識的寫照。如果沒有政治思想領域的徹底變革，這個「幽靈」只會埋葬純粹經濟領域的「改革」與「開放」。與其哀歎改革告終，不如讓「舊的改革」死，讓「新的改革」生。

姚文認為這一變革應當是以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代替馬克思主義。這一想法至少面臨兩點困難：一是儒家思想本身就很難被認為是能夠推動變革

的思想；二是如果觀察當今中國民間思想界，就會發現基本沒有儒家的位置，幾乎沒有人把它當作一種可欲的政治思想。經歷了百年變革的中國，儒家已成「孤魂野鬼」，至多只能迎合領導人守成的需要，難以再起到凝聚改革共識的作用。

周以諾 烏魯木齊

2024.1.9

## 文化革命與政治鬥爭的 斷裂與接續

目前的主流敘事認為，1966年春夏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本質上是毛澤東早有預謀的，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發難，進行黨內清洗的政治鬥爭。毛澤東此前策動的文化領域批判運動，實際是為這場針對黨政幹部的政治運動作前期預備。這種觀點的形成與文革爆發後的時局發展和當事人事後的主觀推斷有很大關係。

吳一慶教授的〈何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發生學再探〉（《二十一世紀》2023年12月號、2024年2月號）一文，以「文化」一詞為切入點，對此類預謀論觀點提出質疑。吳文強調避免後見之明的預設與倒推式的史學，以設身處地的視角從前往後，重新整理「文化大革命」的啟動過程。通過對毛澤東「文化革命」的回溯與對文革初期〈二月紀要〉、〈二月提綱〉、〈五一六通知〉與〈十六條〉等文本的對照分析，文章認為文革發動的初衷確以意識形態領域為限，打擊對象為文

藝、教育界人士，「毛澤東認為他的激進文化理念受阻，因而決意發動一場『文化革命』以反擊和替代中央一線官員所主導的較為和緩、有序的意識形態鬥爭」。後人所熟知的、將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派」的文革，則是在瞬息萬變的局勢下，毛澤東「審時度勢、順勢而為、不斷調整目標與策略的動態性結果」。此後經過一系列錯綜複雜的政治互動，文革進一步失控，形成亂局。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革命」與「政治清洗」當然存在聯繫，但需注意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事件，吳文繼而主張「打開以原創性問題意識為驅動的新的敘述空間」。

吳文對「文化大革命」發動原因的解讀，側重於分析毛澤東的語詞表達、重要文獻的文本邏輯，兼及文革初期高層的黨內互動。由此引申出的另一個問題是：毛澤東「文化革命」的觀點是否準確傳達給基層組織，後者又是否能夠按其設想的那樣，僅僅針對意識形態領域開展更加激進的革命運動？作者指出，「至少在6月中下旬，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高層領導人仍把『文化大革命』理解為思想與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一場大革命，即『文化革命』」。已有研究與資料則顯示，在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很快超出文化範疇，各大院校師生迅速展開針對校黨委的政治抨擊，這一過程要更早於上層的運動轉向。如6月初，南京大學爆發打倒黨委書記兼校長匡亞明的「倒匡」事件。隨着匡亞明被《人民日報》社論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份子」，原本以「反動學術權威」為打擊對象的復旦大學中也出現了學生批判

校黨委的現象，以是否支持校黨委為界，師生群體內部發生分裂（樊建政、董國強：〈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鬥鬼」風潮〉〔《二十一世紀》2022年6月號、8月號〕）。其中，一系列現實因素，如對現狀有所不滿，或在過去的政治運動（如社教運動）中積累了私人仇怨等，都促使師生將矛頭對準黨委，形成派性，這些都不在中央高層的掌控當中。

簡言之，如果將打擊「反動學術權威」確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早期目標，那麼在同一片歷史時空下，下層的運動情形存在偏移與失控的趨勢，甚至還反過來對文革的性質與後續發展產生影響。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通常認為在文革初期，下層黨委「誤解」了毛澤東的權謀，將文革視作文化界內部的又一場意識形態運動；而攻擊黨委的一些學生卻「抓住」了運動的「真正」重點，即黨內部的政治鬥爭。吳文的觀點則提示，事情很可能恰好相反，學生的行為才是有別於上層設想的失控現象，「所造成的失控後果可能遠超出最高領袖原來所料」，這無疑給相關研究帶來了新的思考維度與討論空間。「初衷」與「失控」、中央與基層，箇中張力有待進一步探討。

總的來說，吳文思路清晰，觀點明確，有助於推進我們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原因的理解，揭示「文化革命」與「政治鬥爭」之間存在斷裂與接續的情況。筆者在學習之餘，謹據此粗談一點思考，以冀拋磚引玉，誠盼批評指正。

張玉清 上海

2024.2.28